

岭南思想文化的 演进与更新

覃召文 宋德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岭南思想文化的 演进与更新

覃召文 宋德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思想文化的演进与更新 / 覃召文, 宋德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97 - 6240 - 0

I . ①岭… II . ①覃… ②宋…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 广东省
②文化史 - 研究 - 广东省 IV. ①B2②K29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6785 号

岭南思想文化的演进与更新

著者 / 覃召文 宋德华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2 字数：357 千字

版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240 - 0

定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上编 古代岭南思想文化的演进

引 言	3
第一章 岭南思想文化的发生与发展	6
一 岭南文化的发生及其思想的原始积淀	6
二 早期岭南思想文化与其他外来思想文化的关系	11
第二章 岭南思想文化的涵化历程	21
一 岭南思想文化的汉化	22
二 岭南思想文化涵化中的世界化与对外交流	35
第三章 岭南古代思想文化的分布格局与历史重心	41
一 苍梧思想文化板块	41
二 韶州思想文化板块	47
三 潮州思想文化、梅州思想文化、罗浮山思想文化、桂林思想文化及海南思想文化述略	56
四 广府思想文化板块	67
第四章 岭南古代思想文化的规律与特征	93
一 岭南古代思想文化演变的历史动向与基本规律	93
二 岭南古代文化思想的特质	95

下编 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更新

导 论	109
一 更新的时代条件	109

二	更新的方式与内涵	111
三	更新的主要特色	113
第一章	走向民族觉醒的文化更新	115
一	自卫御侮精神的高昂	115
二	救亡图存主旋律的形成	129
第二章	打破自我封闭的文化更新	139
一	破除“夷夏之辨”的顽固拒外心理	140
二	深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	149
三	力倡学习西方、中西结合	158
四	对西方富强之道的认识由浅入深	172
第三章	推进近代变革的文化更新	208
一	变革理念的重新提出和发展成熟	209
二	对中国积弊的深刻反省和广泛揭露	223
三	实施变革的方案和举措	226
第四章	引领思想启蒙的文化更新	255
一	传统价值观的颠覆	255
二	对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	269
三	近代国民性的改造	275
第五章	掀起革命大潮的文化更新	281
一	洪秀全等人对传统反抗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282
二	民国建立前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新创造	295
三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新发展	308
第六章	借重传统之力的文化更新	323
一	洪秀全与传统文化	323
二	康有为与传统文化	327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343
后记		346

上编

古代岭南思想文化的演进

引言

岭南，又称岭表、岭峤、岭海，泛指我国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地区。汉代的岭南，包含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阸）、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唐代则设岭南道，地域与秦汉时相近，而今称岭南则主要指广东、广西、海南及港、澳等地区。五岭地处南岭山脉，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主要分水岭，而五岭之南又处在珠江流域的中心区域，因此，从江河文化的角度看问题，岭南文化也是珠江文化的中心区域。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开始岭南只是蛮貊之邦、化外之地，但经过数千年来的的发展，岭南文化便从原始蛮荒走向现代文明，由封闭自守走向改革开放，它的风貌与实质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格局和文化形态，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成果，并具有自身的性质和特征。岭南文化的发展到了近代进入更新的阶段，具有开拓性与前瞻性，引领着新的文化风气；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更是产生了质的变化，此时的岭南，经济飞速发展，外贸迅速拓展，思想充分解放，精神高度活跃，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活力。正是凭借着这一点，岭南文化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窗口，为世人所称道，也为世人所瞩目。

岭南思想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灵魂，是岭南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引领着岭南文化发展的路线和方向。在岭南思想文化的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结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前人曾编出《岭南文献》《广东丛书》，今人也整理了《岭南丛书》《岭南文库》，这些都历历在目，显而易见。而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是，在岭南思想文化的发展中究竟有没有自己独有的传统，有没有自己特定的资质。这种独特性是决定其生命活力的关键性要素，故而尤为引人注目。对这个问题，早在清初粤东三大家那里，就已经深入思考过了。陈恭伊在《重刻岭南文献征启》

中曾历数先贤之功德，作者之文辞，虽然今古代迁，但其文统清晰可辨，所谓“轻缣素练，仰淑前修，踵事增华，弥高往辙”^① 即是；其《征刻广州诗汇引》又说：“百川东注，粤海独南其波；万木秋飞，岭树不凋其叶，生其土俗，发为咏歌，粤之诗所以自抒声情，不与时为俯仰也。”^② 字里行间，可看出他对于岭南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特质的坚守与珍爱。同样的观点在屈大均的著作中也屡屡可见，特别是在他的《广东新语》中，就特别以《事语》《学语》《文语》《诗语》《艺语》等篇什论述了交广地区文章学术的发展历史，其中就包含对岭南思想文化传统的热切关注和深入思考，其对岭南思想文化建设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而进入现代之后，对岭南思想文化传统的认识更是深化了。如1941年黄尊生在《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③一书中就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从“大陆文化”到“江河文化”再到“海洋文化”，其发展的重心是“一路南移”的。因此，岭南特别是广东就成了中国文化之要冲，他指出：“广东适当海洋之冲，因此便事事得风气之先”，而这，“便是广东所赖以扶摇直上之一个大关键。”这一观点强调了岭南文化与现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发展动向的关系，对于我们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

前人之论已十分详备，面对着光辉的岭南思想文化传统，自然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它从何处来？它往何处去？它的存在有哪些形态？它的流布呈何格局？它的发展又有何规律和特征？它的趋势和前景又将如何？而所有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又无非是这一文化的演进和更新的问题：演进引领历史，构成了文化现实的基础；而更新从现实出发，通向文化的未来。研究这些问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岭南文化历史面貌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也有利于我们对于岭南文化发展动态的掌握，这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无疑是有着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岭南思想文化的研究呈逐步深入之势，对岭南思想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也得到了许多人的热心关注，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有着不少学术突破，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振奋、令

^① 陈恭伊：《重刻岭南文献征启》，见陈恭伊《独漉堂集》之《文集·征启引颂》。

^② 陈恭伊：《征刻广州诗汇引》，见《独漉堂集》之《文集·上书书牍》。

^③ 黄尊生：《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41。

人欢欣。但这一研究仍有待深入，如何透过文化现象去透析其精神实质，如何通过相关史料去发掘其思想菁华，这在当前仍然有待于加强，仍然需要提升一个层次。有感于此，笔者企求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岭南思想文化的演进与更新，力图触及其中的一些思想焦点问题，虽不敢奢望能取得多大的学术突破，但只求从岭南思想文化研究中找出一些规律，解决一些问题。倘能为岭南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也就完成了本书的写作目的。

第一章 岭南思想文化的发生与发展

一 岭南文化的发生及其思想的原始积淀

要探讨岭南文化思想的历史发展离不开对其文化状况的深入考察，因为文化思想是文化的结晶，即使在最初的阶段上岭南并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但一定的文化意识总是存在的，这种文化意识通过长期的原始积淀不断地传承下来，一旦以文字表达出来，那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化思想。所以，我们的探究完全可以以此为起点。

(一) 岭南文化的发生与南越文化

岭南思想文化的发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学术问题，由于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缺失难考，除了曲江马坝、封开黄岩洞新石器时代等地区留下的不多的文化遗存之外，有关的历史记载十分罕见，而且带有很大的传闻性质。故论及岭南文化，当前学界对其原初形态大都存而不论。而这样的结果，对于研判岭南文化思想乃至整个岭南文化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既然其发生的历史状况不明，那么，这种文化的原质就难以把握，其发展的历史线索也就难以说清，还如何进一步地去谈它的来龙去脉呢？

笔者认为，在最初的意义上，岭南文化及其思想不是外来移入的，不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外来区域文化的横向移植与简单融合，它自有其本土性的原质和要素，有着其原生的文化因素。马坝文化与黄岩洞文化等岭南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表明了岭南文化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起码说明，在最早的意义上，岭南文化与中华其他区域文化一样，是自本自根的，有其悠久的历史及其独特的性质的。其后，随着人类的进化，由于自身文化机制的改进，也由于岭外强势文化的不断影响，岭南文化便开始从蒙昧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

岭南地处中国南方，古称南越，属于百越之一。所谓“百越”（或“百粤”）是指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众多族群部落，从大量的史籍来看，“百越”从大的方面来说包括“南越”和“东越”，《汉书·两粤传》所说的“两粤（越）”正是就此而言；而从小的方面来说，“百越”极言越人部族之多，从古人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扬越”“骆越”“于越”“勾越”“荆越”“蛮越”“闽越”“瓯越”“大越”等诸多说法。而在“百越”的众多部族之中，“南越”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它指的是最早就生活在岭南一带的部族，这一部族的原住民大抵属于马来人^①种系，包括多个部族和民系，随着汉民族的不断移民及文化改造而被逐渐地汉化。南越在秦汉之前有“仓吾”等部族居住，其历史不详。秦初则置南海尉。始皇二十九年增设苍梧郡，三十三年又有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秦末，赵佗割据一方，合并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为南越国。汉初，赵佗更被封为南越王，统领长沙郡以南的区域，并以番禺（今广州）为其都会^②，此后，便有以“南越”代指岭南的说法了。

除了“南越”的说法之外，岭南还有“交趾”“南交”等说法，“交趾”本古名，汉朝安定南越之后，曾在原桂林郡的辖区之内建立苍梧郡，置交趾刺史，掌管整个岭南的军政大权。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上》其中有道：“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当时的苍梧都会设在广信，在今广东封开一带。虽说交趾刺史“持节治苍梧”，但作为一种军事建制，其势力范围覆盖两广、海南、湖南部分与越南北部。汉代南海的王范曾著《交广春秋》，此后，以交趾、南交代称岭南便较为普遍。

（二）交趾、番禺叙略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在先秦两汉之前，岭南文化实际上处于蛮荒不化的历史阶段。这里所谓“蛮荒”主要指其未完全开辟的自然风貌，而所

^① 吕思勉《先秦史》之《第一节 先秦时诸民族》说：“汉族，起自东南。诸民族与我密迩者莫如越。越亦作粤，今所谓马来人也。”《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一八八条《嵎夷即倭夷说》中亦说：“马来人古称越，亦作粤，有断发文身之俗，日人亦然。”

^②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论及西汉时期的九大都会，指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

谓“不化”则主要就其不发达人文现状来说。关于岭南文化的发端，由于史料不足，很难作很详尽的历史叙述，在这里，我们可以集中从“交阯”“番禺”的地名考辨中管窥其大貌。

先看“交阯”。交阯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尧典》在论及尧安定天下后，曾命人掌管四方，这分别是“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方，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这里的“南交”也就是“交阯”。与东方“旸谷”、西方“昧谷”、北方“幽都”相对应，南方也应有相应的地名，这当有脱文，今已难考了。这一说法可以在《墨子》中找到旁证。《墨子》中说：“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可见，在尧时已有“交阯”之名，而且已经纳入尧帝安抚天下的势力范围之中。到了舜帝之时，情况依然如故。传为西汉戴德所作的《大戴记》中有类似的话：“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阯。”所谓“南抚交阯”之类的说法表明交阯只是尧、舜帝王安抚的地域，未必纳入皇朝的版图，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早在尧、舜时代岭南就已经与中原有了密切的关系。

诚然，此时的交阯，并未完全开化。“交阯”其名亦作“交趾”，《礼记·王制》曾论及“中国”（即“中土”或“中原”）与“夷”“蛮”“戎”“狄”四方的关系，其中提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到，“中国”是王制流行之地，是王化之基。而夷、蛮、戎、狄四方则还未完全开发和开化。这里说的“蛮”是指“百蛮”，既包括荆楚，也包括南越甚至西南诸蛮，泛指中原以南的广大地区。其中说到的“雕题”即指雕青文身，不火食则指喜食生，可见当时的岭南尚未完全开化。至于“交趾”之名也与文化习俗相关。《吕思勉读史札记》论及“越裳”时曾引《后汉书》语曰：“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①从这个说法来看，在交阯民俗中，男女交往嬉戏比较自由，不太讲礼仪，不像中原那样恪守夫妇之道，讲究男女有别。

再看“番禺”的说法。番禺的历史传闻，起码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

^①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83条。

皇五帝时代。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山语》论及番山、禹山、粤（越）秀山三山历史时曾详论过“番禹”的由来：

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禹，又落为番。禹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登高望之，犹见其盘旋不断，回抱三城之势。盖司马迁所谓“番禹一都会”，刘安所谓“一军处番禹之都”，任嚣所谓“番禹负山险阻”，皆指此三山之中也。

番禹之名最古。《山海经》云：黄帝生禺阳、禹号。禹号处南海，生徭梁，徭梁生番禹。番禹者，贲隅也。禺阳、禹号者，黄帝之庶子也。番禹，黄帝之曾孙也。则番禹之名以黄帝之曾孙也。……番与贲同音潘，禹与嵎通作隅。

《罗浮记》云：罗山之顶有桂，所谓贲隅之桂也。贲，番也。则又以罗山为番禹也。或曰：罗浮之西麓为白云，番禹者，白云之南麓也。则白云、罗浮皆可名番禹也。……今会城之禹山虽没，而自清远至博罗，皆谓禹山之磅礴焉可也。番禹之山甚大，故秦汉时，以广州之地总称番禹。

屈大均引述的这几段材料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依他的说法，“番禹”（“贲隅”）本是人名，他是黄帝庶子徭梁所生，故是黄帝之曾孙；后来便作为封地之名，又进一步作了山名。第二，番禹的历史从黄帝时代便已开始成为政治都会与军事要地。第三，作为地名的番禹可有两解，狭义的番禹指番山、禹山一带，而广义的番禹则指古时延及清远、博罗的大广州区域。

屈大均所谓番禹乃黄帝之曾孙之说难以确考，但《山海经》中有“贲禹”的说法这却不假，其中也有番禹乃“黄帝之曾孙”的说法。屈大均说“番与贲同音潘”这可以成立，在《康熙字典》中，“贲”的注音有“必巒切”“逋还切”“逋昆切”多种，“逋还切”读“班”，与“番”音很是接近。另外要说的是，“番禹”之名在秦汉时期还曾作“蕃禹”，麦英豪、黎金在《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①一文中列举了多个用“蕃禹”的例证：一是1953年，在

^① 麦英豪、黎金：《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见《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

西村石头岗 1 号秦墓的漆器中发现烙有“番禺”“蕃”字的铭文。二是 1983 年 6 月在南越王墓中发现的南越王二世赵胡龙钮“文帝行玺”金印，以及刻有“蕃禺”“蕃”等字的铜鼎。“蕃”的字音和字义与“藩”相近，都有草木茂盛的意义，而“贲”字从“卉”从“贝”，据《康熙字典》也有“贲若草木”一说，因此同音假借，用来替代“蕃”或“番”也是可以理解的。

秦汉时“番禺”之名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说法主要是从“都会”即政治中心的意义上说的，像屈大均引司马迁说法主要偏重于此；而广义的番禺则主要从军队驻防地的意义上说的，既然其疆域延至清远、博罗等地，这一地域就远比现在的广州要大。因此，屈大均引用的刘安、任嚣的说法是否就一定指三山（粤秀山、番山、禺山）一带，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究。

从“番禺”的名称考辨中我们可以品出蛮荒的意味，除了自然风貌的蛮荒之外，秦汉以前的番禺也还没有充分开化，有关这一点在番禺原住民的风俗习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番禺土著的风习主要有四：一是好生食；二是断发文身；三是信神鬼，好巫祝；四是水居舟行。

好生食即前面说过的“不火食”，这并不是说古番禺人不用火，只是饮食习惯偏于生鲜而已。在《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文辞：“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这里说的“南方”当指“三楚”即“西楚”“东楚”“南楚”之南。这段文字常常被解读为古代百越人有食人的风习。其实，文学的增饰之辞不能完全作为证据。岭南自古就物产丰富，极少有饥馑之灾，因此，史上传闻的那些吃人生番的描述未必完全属实。但岭南特别是广府之人好食生鲜确实历来就如此。至今的岭南人仍好食“生猛”之物，这是历史习俗的延续。

所谓“断发”不等于“被（披）发”，披发不利于在丛林一带活动，而断发就会自由得多。断发可以修剪，但修剪后有所约束，这样更便于劳作和梳洗。据《史记·南越列传》所说，汉代的陆贾劝说赵佗归顺，赵佗以越族的“魋结箕倨”之俗拜见。所谓“箕倨”是席地叉腿坐若箕形，而所谓“魋结”则指将发髻一撮修束为椎形，这是“断发”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断发还可以剪成短发而不修束，如岭南土著中的“平鬟”大抵就属这类。断发这种风习不仅南越有，西南诸蛮也有。而所谓“雕题”即是在面额雕青，扩大来说就是文身，之所以要雕青、文身，或表征勇武，或显现图腾，或求祖上护佑，或避鬼魅凶邪，这是原始部族常见的一种风习，

在古代番禺亦是如此。

在古番禺“雕题”的风俗中包含着特定的鬼神观念，《史记·孝武本纪》有“越人俗信鬼”，“而以鸡卜”之类说法，《汉书·郊祀志》更是说：“粤人俗鬼”，“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祀天神上带百鬼。”在历史上，神鬼观念在中国东方、南方都很普遍，荆楚、吴越及西南诸夷都是如此，而番禺一带此风亦盛。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说：“粤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畜祥者，所在皆然。”今人叶春生教授在《广府民俗》一书中记载了大量与神鬼信仰相关的民俗，从中可以看出岭南的这一风气。与鬼神观念相关，秦汉时的番禺人还有着灵魂不死的观念，无论贵贱都是如此。在第二代南越王赵昧（胡）墓中曾发现殉葬15人的遗骸，在现今广州越秀区、番禺区发现的众多汉墓中，其格局与布置与家居并无大异，只是规模较小而已，这都说明当时的番禺人“事死如生”，在观念上都习惯把死看做生的延续。

番禺地处水国泽乡，故人们惯于水居舟行。《史记·孝武本纪》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善于造舟”。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曾广引汉魏人的评语，如刘安之语“九疑（嶷）之南，陆事少而水事众”，左思之语“篙工楫师，选自闽、禹”，《山海经》之语“番禺始为舟”，这都说明百越之人有水居舟行的习惯。所以，后来的王师南下征服岭南，都有针对性地采用了水路进攻，如秦始皇遣尉佗、屠睢平越，汉孝武帝分兵五路平越，汉光武帝平交趾，都是以楼船开道，水军先行。故汉孝武帝、汉光武帝两次平越的将军都命名为“伏波将军”与“楼船将军”^①，这都是针对着越人善于水斗有备而来的。

二 早期岭南思想文化与其他外来思想文化的关系

（一）早期岭南思想文化交流及其与中原、吴越、荆楚思想文化的关系

早期交趾与番禺的现状表明，岭南文化在很长时期处于未充分开发的

^① 汉孝武帝平越的将领是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汉光武帝平交趾的将领是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从名称可看出汉军平越以水路为主。后世如宋朝潘美灭南汉，元代张弘范灭宋，明代廖永忠灭元，都以水军为主；其中宋代仍沿西江直逼广州，元代与明代虽改由海路进攻，但也仍以水军为主力军。

形态，生活方式也比较原始。但这绝不意味着当时的岭南是完全封闭的环境。一方面，水居舟行的风习无疑扩大了岭南人的活动区域，在先秦两汉时期，岭南人就已经开始了海外贸易。另一方面，随着秦汉之际岭南通衢的打开，岭南与内地的交流也日趋频密。因此，水居舟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岭南人打破封闭性，走向海洋创造了条件。

岭南和海外及内地的来往可以从经济贸易史中看出个梗概。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经说过，秦汉之时“番禺亦其一都会也，多珠玑、犀、玳瑁、果、布（按：‘果、布’，一解作‘果布’，本马来语音译，指龙脑香）之凑”；《汉书·地理志》中也有类似的话，其称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按：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多取富焉”。这说明在很早的时期，番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都会。这从出土文物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南越王墓中曾出土银盒、象牙、乳香，这多为西亚之物，墓中还有胡俑等葬品，这表明此时岭南和内地以及海外都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

岭南和内地的文化交流还可以通过大量的文化遗存看出来，相关的青铜器与陶器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现了不少。其中既有用于礼乐的钟、鼎、铙、盂等，这些铜器与中原一带出土的青铜器相仿，而文化遗存之中用于日常生活的器物则与荆楚一带的青铜器颇为接近，至于用于战争的兵器则与吴越的兵器相类。对此，邱立诚在《广东青铜时代文化类型初探》^①一文中曾有一个大致的结论，他指出：

广东各地的青铜器墓的出土文物还表现出：（1）受楚文化影响很大，如青铜蹄足鼎、羽状云纹罍、编钟、提梁壶等；（2）与吴越文化有密切关系，如青铜剑、越式鼎、鉴、矛；（3）与西南文化有较多往来，如铜钱、箭等本地特色则如人首柱形器和陶器等。“王”字形纹饰应是南越土著人中的一支文化，江西、江苏、湖南等地所见应是文化交流的证据。由此可见，广东发达的青铜文化同样是在各地青铜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从岭南的文化遗存来看，其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

^① 文见《广东省博物馆开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